

环境身份、环境态度对 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

彭远春

【摘要】结合认同理论和环境行为理论模式,利用大学生环境素养调查数据,侧重探究环境身份、环境态度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和环境参与行为的可能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态度假设未获支持,环境身份假设得到部分验证。具体而言,整体环境身份对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有限,而环境态度对大学生环境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大学生环境身份显著性和环境身份突出性越强,其实施的绿色消费行为和环境参与行为越多。环境身份承诺广度对大学生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环境身份承诺深度对其并无显著影响。环境行为意向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有着显著的直接作用和一定的中介作用,而环境行为意向对大学生环境参与行为并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环境行为;环境身份;环境态度;大学生

【作者简介】彭远春,男,博士,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湖南长沙 410083)。

【原文出处】《求索》(长沙),2020.4.149~15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众环境健康风险感知与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9BSH076)。

我国坚持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突出政府部门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中的责任与作用,无形之中致使公众自我避责倾向严重、参与水平不高,进而影响到环境状况的改善与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际上,环境污染与公众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需要公众广泛、持续的参与。而大学生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正接受系统教育,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同时,大学生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参与者,不仅塑造着自身环境行为,亦对其他社会群体了解和参与环境保护产生影响。此外,大学生是社会建设的生力军,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来会成为决策者,是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注重培育大学生环境素养,提升其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水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往往预设环境态度是环境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设计许多环境态度量表来预测环境行为,如生态态度和知识量表、新环境范式量表(NEP)、环境意识量表等^①。但诸多研究发现一般环境态度对特定环境行为的预测力有限,如海因斯(Hines)等人对128项经验研究进行分析发现,一般环境态度同特定环境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平均为0.35^②;另有学者对17项经验研究的元分析表明,其平均相关系数仅为0.26^③。进而有学者将环境态度区分为对自然环境的一般环境态度和针对某一具体环境行为的特定环境态度^④。相比具体环境态度而言,一般环境态度不易受情境改变的影响,较具稳定性,因而能够超越具体情境预测多种行为,而具体环境态度则不具推广功能。我国学者亦遵循环境态度—环境行为这一研究路径,侧重探讨一般环境态度对大学生环境

行为的约束作用。如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有着较为显著的正向关系^⑤,但因环境行为类型而异,环境态度是大学生私域环境行为的最有力预测因素,但对公域环境行为并无显著影响^⑥;大学生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基本一致,但牵涉到自身生活时,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则产生背离现象^⑦。

可见,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之间关系的探讨多从个体微观层面的心理性视角出发,强调环境行为的实施是个体在心理机制作用下的自主选择过程,相对忽视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制约作用。即既有研究侧重将环境态度界定为个体对环境这一客体以及个体对环境行为的态度,其遗漏了一项重要成分,即个体对自我的态度。于是,环境身份(Environmental identity)逐渐引起环境社会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环境行为的崭新理论视角。

魏格特(Weigert)认为,环境身份是个体与自然环境关联并互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动态性自我概念^⑧;斯代特(Stets)等人则指出环境身份是人与自然环境相关联时,所赋予自我的一系列意义;与性别、职业等身份一样,环境身份是个体多重身份体系的一种类型,并将其置于多重社会层级结构之中,提出凸显社会性的“11项环境身份量表”,包含整体环境身份以及环境身份的显著性(salience)、突出性(prominence)和承诺性(commitment)等特性的测量,且证实整体环境身份以及环境身份的显著性、突出性、承诺性对环境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亦通过环境态度间接影响环境行为^⑨。另有研究发现环境身份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有着不同的解释力,如环保主义者等身份变量对环境参与行为有27%的解释力,而对日常环境行为只有6%的解释力^⑩;环境身份对环境运动有60%的解释力,相比消费行为和环境支付行为而言,环境身份对环境参与行为的解释力更大^⑪。但国内关于环境身份的研究仍处于翻译引介阶段,尚无系统的实证研究^⑫。

综上所述,国内外诸多研究发现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解释力较弱,原因可能在于其仅仅关注个体对环境这一客体的态度,并没有涉及个体对自我的态度。而认同理论侧重研究个体的自我态度,环境社会学则基于认同理论提出了环境身份的概念,

认为环境规制、激励与监督更有利于行为主体与自然环境建立正向的互动关系,形成强环境身份,促使行为主体实施环境行为^⑬。即环境身份凸显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因素的重要地位^⑭,能有效联结结构制约与主体能动之间的关系,进而能较好地弥补既有环境行为研究仅仅关注环境态度等心理性因素而忽视结构性因素之不足。本研究结合认同理论,引入环境身份概念,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相结合,以分析环境身份、环境态度对大学生不同类型环境行为的可能影响,以推进相关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理性行为理论认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影响个体的行为意向,而行为实施受制于行为意向,故态度是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计划行为理论则认为,行为意向影响行为实施,行为意向受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到的行为控制的影响,故态度对行为实施有着重要影响。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和多因素整合模式亦强调环境态度借助行为意向对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并且在大多数环境行为研究模式中,环境态度/环境关心常被视为关键性变量^⑮。由此,本研究提出环境态度假设: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H₁);环境态度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同时,亦通过环境行为意向对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H₂)。

认同理论认为自我是个体将自身视为客体的能力,经由社会建构而成,个体在社会中扮演不同角色而塑造多样自我,进而社会通过自我来影响个体的社会行为^⑯。认同则是个体对其所占据的位置、层级身份类型的自我觉察、认可与赞同,其联结着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故可以通过理解个体的身份认同来解释其社会行为。而环境身份具有显著性、突出性和承诺性等特性,其对环境行为实施产生影响:显著性侧重呈现环境身份的外在认可程度,即环境身份是否得到他人的承认,能否从他人处得到帮助与奖赏;突出性侧重呈现环境身份的内在认可程度,在多层身份体系中凸显环境身份的可能性;而承诺性则是个体对环境身份的承诺程度,即依托环境身份指引自身交往和情感投入的程度^⑰。由此,本研究提出环境身份假设:整体环境身份对环境行为有着显著

的正向影响(H₃);环境身份的显著性越强,实施的环境行为(H₄)越多;环境身份的突出性越强,实施的环境行为(H₅)越多;环境身份的承诺性越强,实施的环境行为(H₆)越多。

此外,斯代特等人认为环境身份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同时,亦通过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进而构筑环境身份模型,提出研究环境行为的两条路径:环境身份—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身份—环境行为^⑨。如前所述,在心理学取向的环境行为研究中,环境行为意向往往是环境行为实施的关键变量。由此,本研究亦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作为影响环境行为的中介变量,进而提出如下假设:环境身份通过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H₇);环境身份通过环境行为意向对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H₈)。

(二)数据与变量测量

2020年4月初,课题组依托问卷星平台组织了大学生环境素养调查。依据“省份—学校—专业—一年级”尽量多样的原则推送问卷,并将回答时间低于3分钟、环境行为量表/环境关心量表答项全部一致的答卷删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328份,由来自31个省份、116所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填答。其中男性占48.3%,女性占51.7%;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及以上比例分别为39.0%、27.5%、19.7%、13.8%;生源地为农村、城市的分别占47.7%、52.3%;人文社科类、理工类、医学类、其他类专业学生分别占43.4%、41.6%、13.9%、1.1%。

1. 因变量及其测量

借鉴斯特恩(Stern)等人等对环境行为的界定,私域环境行为与公域环境行为的类型划分及其设计的环境行为量表^⑩,结合本研究侧重“日常生活实践中积极环境行为”的理解,环境行为包含绿色消费行为、环境参与行为两个方面。绿色消费行为量表包括“购买有机水果或蔬菜、购买可降解塑料产品、抵制购买高污染企业的产品、购买无磷洗涤剂”4题项,回答选项分别为“总是”“经常”“有时”“从不”,相应赋值为3、2、1、0。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信度较好且聚集在一个因子之上,故将4题项直接相加生成绿色消费行为变量。环境参与行为则通过“参加环境保

护活动、成为环保组织的成员或志愿者、给环保组织或环保活动捐款、参加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4题项来测量,“有”“没有”两个回答选项相应赋值为1、0,故将上述4题项相加生成环境参与行为变量。

2. 自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采用斯代特的“11项环境身份量表”来测量整体环境身份,包含“我与自然环境是竞争关系/我与自然环境是合作关系、我的生活与自然环境脱离/我的生活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非常关心自然环境/我对自然环境漠不关心、我努力保护自然环境/我完全没有保护自然环境、人类比自然优越/自然优于人类、我对自然环境充满热情/我对自然环境毫无热情、我一点儿都不敬畏自然/我非常敬畏自然、我的生活不依赖于自然环境/我的生活依赖于自然环境、我拥护自然环境的利益/我不在乎自然环境的利益、我想保护自然环境/我想利用自然环境、我对自然环境充满感情/我对自然环境毫无感情”等11个题项,每个项目中有左右两栏对立的观点,以1~5分测量被调查者接近左右栏观点的程度,第3、4、6、9、10、11项与其他题项方向相反,将其方向调整后,相应赋值为5、4、3、2、1。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信度较好且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两个因子,二者共解释了60.62%的变异量。公因子相应聚集在第3、4、6、9、10、11题项以及第1、2、5、7、8题项之上,故将相应题项直接相加生成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和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联结变量。

环境身份的显著性则通过对“环境保护主义者身份被大家承认”“因环境保护主义者身份,曾得到他人的帮助”“因环境保护主义者身份,曾受到奖励”3项问题的回答来测量,“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4个答项相应赋值为3、2、1、0。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信度较好且聚集在一个因子之上,故将3题项直接相加生成环境身份显著性变量。环境身份的突出性则通过询问受访者对“在与大学同学第一次见面、聚会时与人第一次见面、与新朋友第一次见面这三种情形下,最先介绍给对方的身份”的回答来测量,将最先介绍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回答赋值为1、其他回答赋值为0,将3种情境下相应赋值相加生成环境身份突出性变量。环境身份的承诺

性包含承诺广度和承诺深度两方面的指标,承诺广度以“是否在环保活动中认识了朋友”来测量,“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承诺深度则通过对“朋友将我看作环保人士对我很重要”“父母将我看作环保人士对我很重要”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来测量,“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4个答项相应赋值为3、2、1、0,将二者直接相加生成环境身份承诺深度变量。

本研究探讨的是一般意义的环境态度,等同于国内外学者普遍使用的环境关心概念,用CNEP量表^③加以测量。由于第5、7项是负向问题,故对其进行反向赋值,将答项“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5、4、3、2、1,最终使整个量表10题项的方向保持一致。统计分析表明,CNEP量表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均较好,且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其为单一维度,模型拟合程度较好^④,故本研究根据其因子负载进行加权累加,形成环境态度变量。

此外,环境行为意向是本研究的中介变量,通过被访者对“为了保护环境,我愿意放弃便利的产品或服务”“为了保护环境,我愿意购买环境产品而支付更高的价格”的回答来测量,答项“非常愿意”“比较愿意”“无所谓愿意不愿意”“不太愿意”“完全不愿

意”,相应赋值为5、4、3、2、1,并将其直接相加生成环境行为意向变量。另引入性别、专业、年级、生源地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的描述详见表1。

三、数据分析

(一)大学生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逐步纳入环境身份、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等自变量,分别以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环境参与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应结果详见表2。首先,所有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被接受。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而言,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环境身份显著性、环境身份突出性、环境身份承诺广度、环境行为意向、性别、医学类专业、生源地对其有着显著影响,环境态度对其并无显著影响。在纳入环境行为意向这一因素之后,模型解释力稍有增强,解释绿色消费行为的变异性由11.6%增至13.1%。而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对大学生环境参与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将其纳入模型之后,模型解释力并未提升,而环境身份变量对环境参与行为有着较为复杂的影响。可见,环境态度对大学生环境行为并无显著影响,故H₁、H₇在本研究中并未获得支持。

其次,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环境行为意向、环境身份承诺广度、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生源

表1 大学生环境行为研究变量一览表

变量	性质	说明
绿色消费行为	定距变量	分值越高,绿色消费行为水平越高;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2,均值为6.16,标准差为2.34
环境参与行为	定距变量	分值越高,环境参与行为水平越高;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均值为1.25,标准差为1.21
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	定距变量	分值越高,对待自然环境越友好;最小值为6,最大值为30,均值为25.54,标准差为4.64
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联结	定距变量	分值越高,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联结程度越强;最小值为9,最大值为25,均值为21.15,标准差为2.84
环境身份显著性	定距变量	分值越高,环境身份越显著;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9,均值为4.40,标准差为1.98
环境身份突出性	定距变量	分值越高,环境身份越突出;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均值为0.15,标准差为0.54
环境身份承诺广度	定类变量	否=0 是=1
环境身份承诺深度	定距变量	分值越高,环境身份承诺越深;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均值为3.02,标准差为1.53
环境态度	定距变量	分值越高,环境关心水平越高;最小值为7.43,最大值为26.15,均值为21.83,标准差为2.86
环境行为意向	定距变量	分值越高,实施环境行为的意愿越强烈;最小值为3,最大值为10,均值为8.14,标准差为1.41
性别	定类变量	女=0 男=1
专业	定类变量	人文社科类=1 理工类=2 医学类=3 其他=4
年级	定序变量	大一=1 大二=2 大三=3 大四及以上=4
生源地	定类变量	城镇=0 农村=1

地、医学类专业、性别、环境身份显著性、环境身份突出性由大到小影响着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即环境行为意向越强烈、在环保活动中认识更多朋友、对待自然环境越友好、环境身份认可度高、来自城镇、医学类专业的女大学生,实施更多绿色消费行为。而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联结、环境身份承诺深度、环境态度、年级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并无显著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纳入环境行为意向变量之后,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联结对绿色消费行为的显著作用消失,其是否通过环境行为意向间接影响大学生绿色消费行

为,有待在后文分析中加以检验。

再次,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形下,环境身份显著性、环境身份承诺广度、环境身份突出性、性别由大到小影响着大学生环境参与行为,即外界越认可环境身份、在环保活动中认识更多朋友、在人际交往中越突出环境身份的男大学生,实施的环境参与行为越多。而整体环境身份、环境身份承诺深度、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年级、专业、生源地对大学生环境参与行为并无显著影响。环境身份不同特性对环境参与行为有着更大的影响,环境行为意向则对大学

表2 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多元线性回归(OLS)之标准回归系数

	绿色消费行为			环境参与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	.118*** (.016)	.111*** (.016)	.096** (.016)	-.006 (.007)	-.001 (.007)	-.004 (.008)
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联结	.079* (.025)	.064* (.026)	.059 (.026)	-.013 (.012)	.000 (.012)	-.001 (.012)
环境身份显著性	.087* (.041)	.092** (.041)	.066* (.041)	.309*** (.019)	.305*** (.020)	.299*** (.020)
环境身份突出性	.059* (.116)	.060* (.116)	.055* (.115)	.064** (.055)	.064* (.055)	.062* (.055)
环境身份承诺广度	.103** (.140)	.103** (.140)	.101** (.139)	.218*** (.067)	.218*** (.067)	.218*** (.067)
环境身份承诺深度	.037 (.052)	.035 (.052)	.018 (.052)	.002 (.025)	.004 (.025)	.000 (.025)
环境态度	-	.047 (.023)	.030 (.023)	-	-.042 (.011)	-.046 (.011)
环境行为意向	-	-	.137*** (.046)	-	-	.030 (.022)
性别	-.083** (.128)	-.083** (.128)	-.073** (.127)	.052* (.061)	.051* (.061)	.053* (.061)
人文社科类	-.043 (.143)	-.044 (.143)	-.043 (.142)	-.040 (.068)	-.039 (.068)	-.039 (.068)
医学类	.073* (.196)	.074* (.196)	.075** (.194)	.044 (.093)	.043 (.093)	.043 (.093)
其他专业	-.031 (.601)	-.031 (.601)	-.035 (.596)	.011 (.287)	.012 (.287)	.011 (.287)
大一	.087* (.196)	.085* (.196)	.074 (.195)	.057 (.094)	.059 (.094)	.057 (.094)
大二	.049 (.207)	.046 (.207)	.043 (.205)	.025 (.099)	.028 (.099)	.027 (.099)
大三	.009 (.215)	.009 (.215)	.008 (.213)	.019 (.103)	.019 (.103)	.019 (.103)
生源地	-.081** (.123)	-.081** (.123)	-.077** (.122)	-.041 (.059)	-.040 (.059)	-.039 (.059)
调整后的R ²	.114	.116	.131	.242	.243	.243
F	13.245	12.566	13.470	31.316	29.443	27.679
P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p<0.05,**p<0.01,***p<0.001。专业:以理工类为参照组;年级:以大四及以上为参照组。

生绿色消费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整体而言, H₃、H₄、H₅、H₆在本研究得到部分支持,需结合环境行为的具体类型加以修正。

(二)环境身份、环境态度与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的路径分析

本研究依据大学生环境行为影响因素模型(详见图1),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②,并删除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构筑出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路径分析图进行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析,结果详见表3。首先,模型具较好的拟合度,模型的拟合系数分别为:卡方值=355.917、df=87、p=0.000、GFI=0.969、IFI=0.934、CF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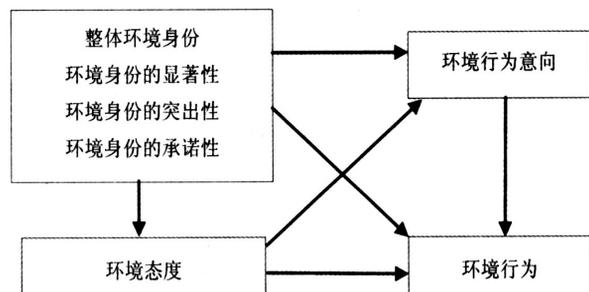


图1 大学生环境行为影响因素模型

0.933、RMSEA=0.048。

其次,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环境身份显著性、环境身份承诺深度、环境态度、性别通过环境行为意向这一中介变量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而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联结、环境身份突出性、环境身份承诺广度等其他变量对环境行为意向并无显著影响。具体而言,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联结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环境身份显著性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亦通过环境行为意向间接影响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环境身份突出性、环境身份承诺广度等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并未通过环境行为意向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环境身份承诺深度、环境态度虽通过环境行为意向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但总效应仍不显著。故 H₂、H₈在本研究只得到部分验证,需结合环境身份的不同特性、环境行为的不同类型进行分析。

四、结论与讨论

整体而言,环境态度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与

表3 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模型之标准化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环境行为意向	绿色消费行为		
	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	.116***	.096**	.016***	.112**
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联结	.038	.060	.005	.065
环境身份显著性	.186***	.067*	.025***	.093*
环境身份突出性	.039	.055*	.005	.061*
环境身份承诺广度	.016	.102**	.002	.104**
环境身份承诺深度	.125***	.018	.017***	.035
环境态度	.131***	.030	.018***	.048
环境行为意向	-	.137***	-	.137***
性别	-.067*	-.073**	-.009**	-.083**
人文社科类	-.013	-.043	-.002	-.045
医学类	-.011	.076**	-.002	.075*
其他专业	.025	-.035	.003	-.032
大一	.083*	.075	.011*	.086
大二	.027	.043	.004	.047
大三	.007	.008	.001	.009
生源地	-.032	-.078**	-.004	-.082**

注:*p<0.05;**p<0.01;***p<0.001。专业:以理工类为参照组;年级:以大四及以上为参照组。基于Bootstrap法,抽取5000次进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检验。

环境参与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而涵括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自我与自然环境的联结两方面意涵的整体环境身份对大学生环境行为影响有限,仅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环境态度是一较为复杂的观念体系,除开新环境范式,还隐含交织着自然功利主义、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诸多观念,即新环境范式的持有者未必准确理解自然平衡、生态危机、增长极限、人类中心主义等理念,从而并不一定实施环境行为²⁸。而大学生正处于预期社会化阶段,其观念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观念体系处于建构与变动之中,进而可能对其环境行为产生影响。

整体环境身份实乃个体与自然环境相关联时所赋予自我的一系列意义,即个体对自我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根本看法。可见环境态度与整体环境身份具有某种共通之处²⁹,环境态度侧重揭示个体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客观属性,环境身份则强调其主观面向,两者都具有抽象特质,而诸多研究发现一般层面的环境态度或理念对具体环境行为尤其是公域环境行为的影响较弱,甚至没有关联³⁰。而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可能与其表述相对具体且蕴含日常环境行为倾向有关。另外,整体环境身份的公因子提取与正负向表述有关,其是否会影响统计结果,这需要更多研究加以检验。

其次,相比整体环境身份而言,环境身份显著性、环境身份突出性和环境身份承诺性对大学生环境行为有着更大的影响。具体而言,环境身份显著性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和环境参与行为皆有显著直接影响,且环境身份显著性通过环境行为意向间接影响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环境身份显著性对大学生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相对更大。环境身份突出性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有着显著直接影响和总影响,亦对大学生环境参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环境身份承诺广度对大学生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环境身份承诺深度对其并无显著影响。

这可能与环境身份特性的不同内涵以及环境行为所属的领域有关:一是绿色消费行为隶属于私人领域,与大学生日常生活实践关联更为紧密,绿色购买、使用与处置等行为的实施更多与自我的内在属

性关联,同时消费实践中他人尤其是同辈群体的认可起着外在支持的作用,进而环境身份在大学生认同体系中位置越高,越得到他人的承认,即环境身份越突出、越显著,就越倾向于实施绿色消费行为。二是环境参与行为发生在公共领域,公共领域行为的实施更需要他人的支持与配合,而环境参与通常以维护环境权益、缓解环境问题和提升环境质量为目标,受诸多因素的制约,需要动用和整合更多的资源³¹,社会网络的扩大、环境身份的自我认同与他人认可及支持,有利于环境参与行为的实施,故环境身份承诺广度、环境身份显著性与环境身份突出性对环境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大学生处于预期社会化阶段,为顺利进入社会做准备,其参与活动的目的更多在于短时间之内锻炼能力与完善自我,而日常环境保护活动收效较缓慢且成效不太明显,环境参与活动则涉及诸多利益相关者且错综复杂,故父母、朋友等重要他人对其环境身份的不太关注或者忽视,可能更有利于环境行为的实施。

再次,本研究发现整体环境身份对环境行为的解释力有限,而环境身份的显著性、突出性和承诺广度对大学生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与其侧重心理特质或结构意涵有关。环境身份最早源自心理学的认同理论,魏格特将其定义为人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中,个体形成的一系列有关自然环境和身份的自我观念。尔后斯代特等人利用社会认同理论对其进行拓展,增加了环境身份的身份类型化特征和多重身份的结构层级性。整体环境身份实则对应心理学的环境身份界定,环境身份的显著性、突出性和承诺性与社会认同理论内在关联,凸显结构意涵。

此外,环境行为意向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大学生环境参与行为并无显著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本研究的环境行为意向的测量主要涉及放弃便利的产品和服务、承担更高的价格等内容,其距离绿色消费行为相对较近,而与环境参与行为的距离相对较远;另一方面,环境行为意向仅仅是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并非其最为关键的因素³²。实际上,环境行为的实施往往需要克服一定障碍或者承担相应代价,故条件是否具备、制度是否完善、规范是否明确、重要他人

是否期待、金钱与时间成本是否适宜等因素都可能对环境行为产生影响,故后续研究应深度挖掘关键中介变量。

(感谢孙慧慧、曲商羽同学在资料收集与整理中所做的贡献)

注释:

①周志家:《环境意识研究:现状、困境与出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②Hines J. M., Hungerford H. R., Tomera A. 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vol.18, no.2, 1987, pp.1-8.

③Bamberg S., "How Does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fluence Specific Environmentally Related Behaviors? A New Answer to an Old Ques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23, no.1, 2003, pp.21-32.

④Kaiser F. G., Wiring S., Fuhrer U., "Environmental Attitude and Ecological Behavi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19, no.1, 1999, pp.1-19.

⑤钟毅平等:《大学生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调查研究》,《心理科学》2003年第3期。

⑥李莉、范叶超:《环境意识对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1年第9期。

⑦徐永荣等:《十年间武汉市大学生环境意识的变化及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比较研究》,《教育教学论坛》2012年第31期。

⑧Andrew J. Weigert, Self, Interac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Refocusing Our Eyesigh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159-175.

⑨Stets J. E., Biga C. F., "Bringing Identity Theory in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ociology Theory, vol.21, no.4, 2003, pp.398-423.

⑩Kempton W., Holland D. C., "Identity and Sustained Environmental Practice"; In Clayton S., Opatow S.(Eds), Ident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Natur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3.

⑪Dono J., Webb J., Richardson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Activism,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Social Identit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30, no.2, 2010, pp.178-186.

⑫林兵、刘立波:《环境身份:国外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⑬刘立波:《环境身份理论视域下的青年群体环境行为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6期。

⑭林兵、刘立波:《环境身份:国外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新视

角》,《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⑮彭远春:《国外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述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8期。

⑯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⑰Stets J. E., Biga C. F., "Bringing Identity Theory in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ociology Theory, vol.21, no.4, 2003, pp.398-423.

⑱Stets J. E., Biga C. F., "Bringing Identity Theory into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ociology Theory, vol.21, no.4, 2003, pp.398-423.

⑲Stern P. C., "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56, no.3, 2000, pp.407-424.

⑳分别是:(1)目前的人口总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够承受的极限;(2)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常常导致灾难性后果;(3)目前人类正在滥用和破坏环境;(4)动植物与人类有着一样的生存权;(5)自然界的自我平衡能力足够强,完全可以应付现代工业社会的冲击;(6)尽管人类有着特殊能力,但是仍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7)所谓人类正在面临“环境危机”,是一种过分夸大的说法;(8)地球就像宇宙飞船,只有很有限的空间和资源;(9)自然界的平衡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打破;(10)如果一切按照目前的样子继续,我们很快将遭受严重的环境灾难。参见洪大用等:《检验环境关心量表的中国版(CNEP)——基于CGSS2010数据的再分析》,《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㉑卡方值=82.549、df=22、p=0.000、GFI=0.988、IFI=0.980、CFI=0.979、RMSEA=0.046。相应题项的因子负载为0.54、0.66、0.72、0.56、0.24、0.51、0.31、0.42、0.56、0.71。

㉒鉴于环境态度、环境行为意向对环境参与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即二者并未发挥中介作用,故未将大学生环境参与行为纳入路径分析,后续研究中需要努力挖掘关键性中介变量。

㉓Dunlap R. E., Van Liere K. D., "The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A Proposed Instrument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vol.9, no.4, 1978, pp.10-19.

㉔刘立波:《环境身份与环境意识:异同辨析与启示》,《生态经济》2017年第6期。

㉕Axelrod L. J., Lehman D. R., "Responding to Environmental Concern: What Factors Guide Individual Ac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13, no.2, 1993, pp.149-159. Grob A., "A Structural Model of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15, no.3, 1995, pp.209-220.

㉖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㉗Stern P. C., "Toward a Coherent Theory of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56, no.3, 2000, pp.407-424.